

趙世炎烈士資料匯編

(包括：回忆录、訪問記錄、原始資料等)

下 冊

1962年3月編

資料目錄（下冊）

五 有关在江浙区活动的資料（1926.5～1927.7）

1. 訪問朱英如同志談話記錄..... (245-252)
2. 訪問楊龙英談話記錄..... (253-254)
3. 訪問孫詩圖同志談話記錄..... (255-268)
4. 訪問楊夢雁（裕父）談話記錄..... (269-272)
5. 訪楊汉义（杏根）談話記錄..... (273-275)
6. 訪問黃逸峯同志談話記錄..... (276-281)
- 附：提訊案犯徐輝祖筆錄..... (282-284)
7. 回忆赵世炎同志..... 徐梅坤 (285-293)
8. 怀念施英同志..... 史照华 (294-297)
9. 訪問刘錫武同志談話記要..... (297-298)
10. 訪問何成湘同志談話記要..... (298-299)
11. 訪問赵伯恆談話記錄..... (300-301)
12. 訪問董星五先生談話記錄..... (301-302)
13. 吳文琪談話記錄..... (302)
14. 訪問范家宝（志英）談話記錄..... (303)
15. 訪問何公超先生記錄..... (304)
16.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回忆..... 康生 (305-311)
17. 智斗拦路虎..... 任其祥 (312-314)

18. 訪問朱世杰 (杓) 同志談話記錄.....	(315-322)
19. 訪問瞿素珍談話記錄.....	(323)
20. 訪問錢釗石 (金寶) 談話記錄.....	(324-326)
21. 訪問林生仁談話記錄.....	(327)
22. 訪問孙长胜同志談話記錄.....	(328-330)
23. 上海总工会招待新聞界.....	(330-335)
24. 回忆赵世炎烈士为党忘我工作和壮烈的牺牲——郝光先.....	(335-338)
25. 上海邮局老工人对赵世炎同志的回忆.....	(339-342)
26. 訪問謝庆斋同志談話記錄.....	
27. 訪問江元青談話記錄.....	(344-347)
28. 苏幼农同志对世炎同志的回忆.....	(347-350)
附(1) 共产党夏仁章被拘 (世炎同志被捕).....	(350)
(2) 姚克給总探长盖文斯的报告.....	(351)
(3) 上海共产党重要机关封閉.....	(351)
(4) 提审案犯張葆臣 (澄) 笔录.....	(352-351)
29. 对赵世炎同志的回忆.....	陈鈞 (361-365)
30. 訪問張維楨同志的談話記錄.....	(366-372)
31. 訪問郑明德談話記錄.....	(373-377)
附：提訊案犯吳瑜 (苏中、复生、濱沐) 笔录.....	(378)
32. 赵世炎烈士典范事蹟片断.....	刘尊——(379-385)
33. 訪問任其祥談話記錄.....	(386-387)

- 34 1927年到上海找寻世炎的一段经过(赵世炯口述).....(388-390)
- 35 关于我所知道的赵世炎的情况.....程 远 (390-391)
- 36 赵世炎烈士遗事.....赵世炯 (392-393)
- 37 悼赵世炎同志.....肖 三 (394-398)
- 38 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399-400)
- 39 赵君世炎事略.....(401)
- 40 悼赵世炎同志(恢) (摘自“解放日报”).....(402)
- 41 涂德云等四篇谈话记录摘记.....(403-405)

第五部分

1926年5月在广州参加“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时。

有关在江浙区活动的资料 同志都是主席团的成员。

(1926 ~ 1927)

这次会上少奇和立三同志都作了报告。我忘不了，只记得有一天他主持会议，公布了各地给大会来的贺电、贺信，全总审查报告对他也参加了。

在上海见到世英同志，是在1927年的冬天，他当时在总工会负责。总工会有好几位负责人，如：汪寿华、王大道、李伯之等，但主要的还是世英同志负责。我在纱厂工会负责，因此常和他见面。当时我们同志之间都互称同学（自离开会派同志），但是对世英同志我们却总称他“赵先生”，总觉得他比我们高些同学不好意思，但他却很严肃的批评我们说：“我们都是同志，为什么叫我先生啊？过去是有钱的人才读书，我们穷苦人没有文化，所以要革命么。以后你们也要好好学习，只有掌握了文化，才能更好的作革命工作”。

世英和世英同志经常给我们作报告，讲国际国内形势。当时大家都爱学习，但有些同志却把报告随便乱划、乱涂，生活散漫，也不整理卫生，把住的房子搞得很乱。有一次被世英同志发现了，他很严肃的批评我们，“这不行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看就知道这是共产党的机关以后不能这样浪费，应该谨慎一些”。在同志们的监督下，逐渐改变了坏风气，世英同志严肃，但同志们对世英同志很尊重，都为他有学问。

(一) 訪問朱英如同志談話記錄

我于1926年5月在广州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时，第一次見到赵世炎同志，他和少奇、立三、仲夏等同志都是主席团的成員。这次会上少奇和立三等同志都作了报告，世炎同志是否也作过报告記不得了，只記得有一天他主持会议，公布了各地給大会来的賀电、賀信，全总审查提案时他也参加了。

在上海見到世炎同志，是在1927年的春天，他当时在总工会負責。总工会有好几位負責人，如：汪寿华、龙大道、李伯之等。但主要的还是世炎同志負責。我在絲厂工会負責，因此常和他見面。当时我們同志之間都称同学（内部开会称同志），但是对世炎同志我們却总称他“赵先生”，总觉得他知識比我們高称同学不好意思，但他却很严肃的批評我們說：“我們都是同志，为什么叫我先生啊？过去是有錢的人才的讀書，我們勞苦人沒有文化，所以要革命么，以后你們也要好好学习，只有掌握了文化，才能更好的作革命工作”。

亦农和世炎同志經常給我們作講演，講国际国内形勢。当时大家都重視学习，但有些同志却把報紙隨便乱划、乱扔，生活散漫，也不講究卫生，把住的房子搞得很乱，有一次被世炎同志来发现了，他很严肃的批評我們，“这不行啊，如果敌人进来，一看就知道这是共产党的机关，以后不能这样浪漫，應該謹慎一些”。在同志們的心目中，認為亦农同志和气，世炎同志严肃，但同志們对世炎同志很尊重，認為他有學問、

有能力，对同志谦虚教育；他在男女社交方面也不象其他同志那么浪漫，而是很严肃的，因此许多女同志更加敬重他。

有一次世炎同志给我们讲课，他问我：“你说什么叫牺牲个人？”我说：“牺牲个人就是去死”。他说：“不对，革命不一定都要死的。牺牲个人就是要自己的一切服从组织。譬如：组织上派你到某处去工作，你不愿去，这就是不愿牺牲个人；牺牲个人当然也包括死在内，不过革命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得更好；如果有必要，死也要死得有价值”。他每次给你解释问题总是这么通俗，简短，清楚明了。

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陶静轩等同志被害。罗亦农同志向我们传达了静轩同志被害的情况：他在就义时是面向西，表示没有忘记沪西的工人弟兄，他说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工人弟兄，没有完成党给他的任务。同时他还滔滔不绝的向大兵讲革命的道理，大兵们都不忍向他开枪。静轩同志死后是大兵凑钱给他买了一口棺材，把他埋葬了。亦农同志向我们传达了这些情况之后说：“共产党员就应该这样去死，死得有骨气”。

第二次武装起义时，赵世炎同志在闸北青云路洪发里（这是江浙区委党内公开的办公机关）指挥战斗，洪发里对面住着保卫团分部，战斗开始之前，世炎同志派我到外面侦察情况，他告诉我，不要那么一板正经的，要装扮成一个浪荡的女人：拖着鞋，嘴里吊上一枝香烟，到马路上听听风声。我出去了一回，看到保卫团进进出出很紧张，我便很快的回来向他报告。我自己装扮那个样子也觉得好笑，但他仍是很严肃的对

我說：“这样很好，不过拿香烟的姿势还不大象”，說着又替我糾正了姿势，我又出去了。

赵世炎和汪寿华同志下令給参加起义的兵艦上的党员同志，要他們在起义时开炮轟击高昌庙兵工厂，在派人去送信时，寿华同志說：“这个命令是催命的文書，成功了是英雄，不成功这些同志的命就完啦”。世炎同志說：“革命嘛就是这样，要嘛我們革命了他的命。要么人家革掉我們的头”。

第二次起义之后，开始組織市民政府，罗亦农、汪寿华等同志去出席市民政府會議，因此区委的工作主要的由世炎同志負責。这样他的工作显得格外緊張。經常开会，但总是一些決策性的会他才参加。市民政府开筹委会我也参加了，各界市民代表都出席了會議，当大家都到齐坐定之后，亦农同志穿得整齐，很有神气的从外面走进来，汪寿华同志起立介紹說：“这是我們共产党的省委書記”，全場的代表都很惊奇的望着亦农同志，亦农同志很扼要的講了党的统战政策，便离开會場。事后汪寿华同志對我們說：“他們認為我們党的領袖是三头六臂呢！都那么惊奇”。

第三次武装起义前恩来同志来了，当时我們都称他“周大哥”，他是中央军委書記，三次武装起义的組織領導是恩来、世炎、亦农等同志負責。这次武装起义分七个战斗区域，其中閘北和南市是兩個重点区，尤其是閘北是重点的重点：有火車站、湖州會館、商务印書館俱樂部、警察总署等等，敌人兵力相当雄厚。因此亦农和世炎兩位書記各亲自領

导一个重点（我一直認為世炎同志也是書記）；亦农在南市，世炎同志在關北。在进行三次起义的准备工作时我和世炎同志在一起，我們分工有的去买紅布做袖章符号，有的去运送武器，战斗开始时我們便見不到世炎和恩来同志了。

四月十一日，区委几个主要負責同志在潮州会館开会，我也参加了。會議主要是討論：杜月笙請汪寿华同志吃飯，去还是不去？世炎同志主張不去，他認為“流氓是反复无常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汪寿华同志表示：为了緩和当前的局面應該去，宁願为党牺牲。爭論的結果是多数人同意寿华同志去，李伯之同志要求一块去，最后世炎同志說：“好吧，去也好，但不要两个人都进去，寿华同志先进去，伯之同志在外面听风，看情况不好馬上回来报告”。汪寿华同志临走时說：“兩小时內不回来就是出事啦”。結果汪寿华同志真的一去沒有回来，——流氓头子杜月笙把他杀害了。

四月十二日上午，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繳了武装糾察队的武器，赵世炎和很多同志，在宝兴路用粉笔在墙上馬路上写标語，記得有兩条是“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求停枪”，工人們面对国民党軍隊大吵大罵，說他們不要臉，帝国主义的飞机在半空低飞給国民党助威。

“四·一二”慘案之后，我們党和工会組織都轉入地下，世炎同志讓我租一間小房子把秘密的文件放在那里，人住在另一个地方，結果有兩個同志却帶国民党的軍官到这里打麻将。我把这件事报告世炎同志，他大发脾气，說这是違犯紀律，赶快搬掉。有一次我在馬路上碰見他，

他在一家書店門口看書，我感到多日不見，想靠近他和他談談，他啾啾咀表示不讓我接近他。後來我便走開了。

經過蔣介石反动派的殘酷迫害，我們有許多同志被捕和犧牲了。所以開會時有些同志就洩氣，而世炎同志却總給我們打氣。有一次開會，他說：“看，我們開會的人數一次比一次少了，你們怕不怕？”我們回答說：“不怕”。他又說：“革命嘛，就是這樣，要經過艱苦的鬥爭和流血犧牲的，反动派的監獄再多，也不能把我們全關起來，只要有一個人，我們的事業就能發展，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當時有一些同志確實是動搖了，企圖離開革命，如商務印書館的工會負責人章郁菴（即章乃器的三弟）原來鬥爭很堅決，“四·一二”後害怕了，要求到國民黨軍隊里去搞策反工作（他大哥在國民黨軍隊作保安團團長），並要登報聲明，亦友和世炎同志對這些同志採取很耐心但又很嚴肅的態度，世炎同志用一種無可奈何的、平靜的語氣對他說：“好吧，你登報聲明只能說不與任何黨派發生聯繫，但不能聲明是退出共產黨。如果那樣作就是叛黨”。章郁菴到國民黨軍隊之後也沒有搞什麼策反，結果黨的關係也失掉了。另有一些人可恥的叛變了，並且幫助敵人迫害我們的同志，有一次一個叛徒跟踪余立亞同志（即王炎夏，時任陞西區委書記），向他索錢，並威脅說不給錢就向國民黨報告。余立亞同志把這件事報告給世炎同志，並說今天晚上要帶錢回去，應付那個叛徒，世炎同志說：“不能給他錢，這樣顯得我們黨是用錢買安全，以後把他甩掉就是了”。

大革命失敗之後，我們的工會組織基本上被搞垮了，敵人又成立所

謂“工統會”。工人們都不滿這個“工統會”，有一天幾個工人把我拉到工人“工統會”辦公室里，說：“還是朱阿姐來給我們搞工會吧”，他們還建議我化兩毛錢買一本“三民主義”。我說：“不行，得回家問問媽媽”。回來後我便把這件事報告給世炎同志。我表示可以去，以工統會的名義作自己的事了。他很著急，對我說：“以後可不能再去了，再去連命都沒有啦，你趕快到浦東去吧”。並且立即親自動手給我寫介紹信。以後我便離開市區到浦東去了。從此我就沒有再見過世炎同志。

關於趙世炎同志被捕的消息，是7月3日黨內一個負責同志傳達給我們的。韓步先出賣了世炎同志，敵人捉到趙世炎同志，把韓步先帶來對証，韓見到世炎同志，連頭都抬不起來，不敢當面指証，世炎同志拍桌子大罵：“你叛徒，可恥，我就是施英，是黨員，我沒有罪！”在審訊的時候，世炎同志對法官說：“你們講不講道理？講道理就放了我，因為我沒有罪；不講道理干脆把我殺了”。這個負責同志最後還說：“我們要學習趙世炎同志這種鬥爭精神，要堅決的和敵人、叛徒鬥爭，以維護黨的利益；同時還要爭取活下去”。

另據梁桂芳對我說世炎同志在獄中還鼓勵被捕的同志說：“革命就是要流血的，要改造社會就要付出代價”。敵人要拉他出去槍斃時，同難的人對他說是家裏有人來看他。但他自己心里明白。他從容的站起來，對同監的同志們說：“永別了！同志們！”並且很快的拿起筆寫了一篇很長的遺書。槍斃時他還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新軍閥！”聽說一連打了七槍，頭几槍他一直是站着，並且大喊：“補槍”。

赵世炎同志給我很多教育，我對他印象很深，聽到他被害的消息之后，我們好多同志都哭了，大家說：“这么好的領導同志都被害了！世炎同志告訴過我們，不鬥爭就要作亡國奴，我們一定要記住他的話，加強鬥爭”。

我於1927年8月被捕也關在楓林橋監獄，和梁桂芳關在一起，她和鄭明德曾告訴我說，世炎同志臨就義前在很短的時間內寫了一個遺書。（記錄者註：在第一次訪問鄭明德時他也提到世炎同志有個遺書，并說這是听當時的法官汪士清說的，但第二次訪問時他又說汪士清說的不是世炎而是瞿秋白。——鄭明德的說法顯然是不對的，因為他向朱英如說的時候是在1927年，而瞿秋白同志是1933年才犧牲的，而且是在長汀不是在上海，所以這一點仍須調查。）

1960年11月7日整理于沪

附： 关于赵世炎同志的补充材料

- 朱英如 -

(1)一九二六年在广州开会时，看过一次电影是卡通片，一个穿黑衣的美国传教士，面孔很漂亮，样子很慈善。一转过身，忽然一下变得很可怕，嘴里伸出两颗獠牙，獠牙一下又变成两只手，抓住中国人吃进去。再转过身来，又变成一个很漂亮慈善的传教士。我当时看了不懂是什么意思。第二天赵世炎同志在招待所召集我们开座谈会，参加的有二三十个代表。赵世炎同志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帝国主义发了战争财。政治英国出面，经济美国掌握，中国铁路矿山，向美国押款，被美国掌握。美国文化侵略很厉害，在中国办教会学校、设教堂，象甘肃那样冷僻的地方，也有教堂，传教士是美帝国主义的耳目，他们以传教为名，进行侵略。坏的中国人入了教，杀了人，跑到教堂，官司也不吃，有治外法权保护。我们听了很气忿，回到上海，逢教堂做礼拜，我们就自己编了歌唱：“打倒耶稣，打倒耶稣，除基督，帝国主义先锋，齐驱逐，齐驱逐”。

(2)我们叫赵世炎同志“先生”，他说：“为什么叫我先生，是不是我多识一点字？为了大家没有文化，为了大家将来都有书读。……向忠发不识字，理论很好，他讲出话来，照他的话记下来，就是一篇宣言。你们好好工作，后面有人帮助。以后不许叫我“先生”，我们是“同志”

1960年2月10日

(二) 訪問楊龍英談話記錄

1926年時，我在滬東做工，同時還在黨和工會所辦的“工人平民學校”唸書。趙世炎同志那時在這個“學校”教書，經常給我們上課，還教我們唱歌。他那時教我們的歌子很多，都是很短的和帶有鼓動性的，但現在一般都記不清了，只記得下面兩首了：(1)“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2)“來！來！來！工友們快團結，大家來打倒那資本家，我們的快樂日就來到”。

“五卅”一周年的頭兩天，趙世炎同志在“平民學校”向我們這些學生（當時我還是O.Y）布置“示威”活動，決定在“五卅”那天在南京路上搞一個“飛行集會”。那天早上，大家都以海關的鐘為準，對好時間，從外灘一直到跑馬廳的各個轉彎口都散布有我們的同志。上午九點鐘，哨子一吹，大家就立即行動起來，喊口號，撒傳單（當時的口號有：“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軍閥！”，“國民革命成功！”“打倒資本家”，“打倒買辦階級！”，“工人們團結起來”……）此外，還用瓶子里面裝黃砂，向汽車、電車投擲，打外國人和資本家的汽車。上午九、十點鐘是南京路上人最多的時候，等巡捕趕來時，我們大家手裏的東西都散完了，用完了，就滲進人羣或裝着到商店裏去買東西，這樣巡捕也抓不到人。然後，我們就慢慢地散去了。

“五卅”一周年示威後不久，趙世炎同志就調到上級去了，就不在

沪东了。以后我們就没有什么接触了。

第二次武装起义时，1927年2月22日下午二点鐘，我們工人暴动后，聚集在老西門公共体育场开会，准备迎接国民革命軍。那一天赵世炎和罗亦农都在台上，赵还講了話（記不得內容了）。后听說国民革命軍沒有来，就散会了，第二次起义也失敗了。

第三次武装起义那一天，沪东、南市沪西拿下来后，工人糾察队和民众就聚集到公共体育场开会，并成立了苏維埃临时政府。赵世炎也参加了这个会，好象也講了話。会后还举行了示威遊行并立即支援閘北的战斗。

攻下閘北后，在湖州会馆开过一次大会。印象不深了。

此后，我就回到沪东去工作了，就不知道也沒有見過赵世炎了。

“四·一二”后我就离开了上海，关于赵世炎同志被捕和被害的情况我不知道。

（楊龙英現在南洋电机厂作工）

1960年10月28日整理于上海

(三) 訪問孫詩圃同志談話記錄

1925年我在商務印書館發行所作學徒，當時只有十四歲，“五卅”慘案時開始接近黨，孫中山逝世一周年上海開紀念會我參加了，以後的幾次罷工我也參加了，由於表現積極，因此被吸收入團（當時黨團員在政治上好象沒有什麼區別，只是按年齡區分）。

就我所知黨在上海的活動起初是先由上海大學開始活動起來的，以後發展到商務印書館。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較快。商務印書館最早的黨員是沈雁冰、馮定、陳雲等同志，以後又發展了章郁菴、徐新之等人。再以後黨組織擴大分成發行所、編譯所、印刷所等三個支部。商務印書館黨組織在1926年冬天前是屬江浙區委直接領導，以後閘北區委成立是屬閘北區委領導但實際上許多重大問題是由土總及江浙區委決定的，當時閘北區委書記是郭伯和同志，區委對外活動都是宣傳部長黃逸峯（澄鏡）同志，他很活躍。（“四·一二”後施英同志派他到南京任地委書記）。

我第一次見到施英同志是在“五卅”一周年的紀念會上，當時有一、二百個黨團員在商務印書館的一間房子里開大會。施英同志作了長篇的報告，主要內容是對前一段工人運動的總結，並提出今後鬥爭任務，指出：前一段的工人運動主要是在帝國主義企業中進行，而且主要是經濟鬥爭；今後在華商（中國資本家）企業中也要大搞，而且要強調由經濟鬥爭轉入政治鬥爭。這次報告既帶有總結性又有鼓動性，大家都說報

告的好。报告的中心内容都反映他在“响导”上发表的“五卅一周年的教训和上海民众的任务”一文中。

施英同志是1926年5月来上海的，他对外名义是总工会的负责人之一，总工会工作是汪寿华同志负责，但实际上许多重大问题还要请示施英同志作最后决定。施英同志在党内威信很高，特别是在闸北，提“赵世炎”很少有人知道，一提“施英”没有不知道的。当时开群众大会他很少出面，有时出面也是很简短、很明确的讲几句话就走；但党内开会他是经常出面的，而且报告的较长，有时一两个小时，也总是具体明确。

“五卅”一周年的大游行是施英和汪寿华同志领导的，游行公开指挥所在南京东路福建路口同羽春，秘密的指挥所在天津路一个小旅馆的楼上，施英和汪寿华等同志就在这里负责总的指挥。当时的游行是这样的：先有一些人秘密的携带传单、旗子潜伏在南京路各商家、路上和人行道上，单等华界的游行队伍一到，命令一下，所有参加游行的人很快的集结起来整队游行，邮局自行车为先导，呼口号、撒传单，走一段路立即散开，等巡捕闻讯赶来镇压时人已跑完；不过有些工人也和武装巡捕发生冲突，有一些电车不停下便被打碎了玻璃。这样游行的组织准备工作是很复杂的，游行前的编队，列分区域和游行路线，行动方法等等都是施英同志亲自计划布置的。

我们商务印书馆的党和工会组织开始活动的较早。商务印书馆于1926年春第二次罢工取得胜利以后，职工工资普遍增加，此后印刷